

歐陽希君

古陶瓷研究文集

歐陽希君·著



欧阳希君
古陶瓷研究文集

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 德
图文设计：大德公司

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

作 者	欧阳希君
出 版	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
面 数	448面
尺 寸	210mm×285mm
字 数	553千字
图 幅	约1780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元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4)
前 言	(5)
陶器起源再思考	(6)
陶与瓷的分辨	(8)
高温“铜红釉”起源再探	(14)
日本所藏“灰被天目”之窑口探究——兼论日本“瀬户烧”的根源在中国 福建	(18)
日本“瀬户天目”寻源	(22)
茶壶 茶盏 茶洋窑	(25)
建窑系之“釉装饰”及分类初探	(28)
黑釉系列“胎装饰”试析	(33)
试论黑釉陶瓷的绘画装饰	(36)
黑釉瓷“特殊装饰”探微	(39)
揭开鹧鸪斑神秘面纱——鹧鸪斑纹及窑口考释	(45)
福建建窑与江西吉州窑鹧鸪斑品种的比较研究	(54)
介绍几件日本藏曜变天目	(58)
海外及国内收藏的福建宋代遇林亭窑金彩天目	(62)
木叶纹装饰研究	(67)
试析剪纸贴花瓷及其源流	(74)
“建窑”——说不完的话题	(79)
也说“建盏”及其他	(83)
还说“建盏”及其他——兼答王志军先生	(85)
论钧窑年代、性质兼及其他	(90)
青花“科学定义”的疑惑和若干问题思考	(117)
“宋青花瓷”辨考	(121)
吾不识元青花	(134)
几件“宝用”款官、哥瓷器的真伪考辨	(140)
福建宋元瓷窑“仿龙泉”与龙泉窑的异同及外销初探	(146)

龙泉窑瓷与韩国高丽青瓷的简单比较——和陈永志、苏东等先生商榷	(149)
高丽青瓷与李朝瓷器略说——兼谈王志军《高丽瓷器的收藏与辨伪》	(152)
“三彩”漫谈	(159)
对一件辽三彩的质疑	(162)
绞胎、绞釉陶瓷器概述——兼及相关问题探讨	(166)
精美而特殊的陶器——漆衣陶、锡涂陶	(208)
陶瓷扑满研究	(213)
从闽北古陶瓷想到的……	(218)
从闽北古陶瓷谈丧葬礼	(221)
闽北明器说谷仓	(224)
关于瓷墓志——兼谈闽北瓷墓志及其他	(228)
谷仓多角瓶、多管瓶之演变新考	(235)
五联罐与堆塑罐等明器源流及演化过程	(239)
对陶瓷单、双管及多管插器的思考	(242)
青瓷“兽形器”的思考	(247)
博山炉源考——兼说博山炉为“魂瓶”	(249)
虎子再考	(256)
贯耳瓶略考	(259)
说“鬼灶”	(262)
福建宋元铅釉陶瓷器	(265)
福建宋代陶瓷省油灯	(269)
福建宋代陶瓷枕	(271)
高足莲花炉——宋代新品种	(274)
罕见的巨无霸——赤土窑莲花尊	(280)
介绍一对珍罕的纪年谷仓兼买地券——兼谈地契与地券	(282)
介绍一件“太原郡”铭轴环	(286)
“珠光青瓷”非元青花瓷	(288)
从几组汉陶俑观古代乐舞——兼说“阿憨玉雕”原型为仿东汉“俳优陶俑”	(292)
古陶瓷中的“性文化”	(296)
“火标”再探	(305)

“试照”初考	(315)
窑业工具考——瓷刀	(319)
陶瓷考古、研究散谈	(321)
读《瓷器收藏实鉴》有感	(323)
记一次漳州窑考察	(326)
福建漳平市新发现明代瓷窑——坑内窑调查	(328)
福建古窑撷珍	(331)
(一)漳浦竹树山窑	(331)
(二)漳浦赤土窑	(332)
(三)漳浦北旗窑	(335)
(四)漳浦南门坑窑	(336)
(五)漳浦石寨窑	(337)
(六)福清石坑窑	(339)
(七)福清半岭窑	(341)
(八)南平茶洋窑	(342)
(九)建阳“建窑”	(343)
(十)浦城大口窑	(344)
(十一)厦门汀溪窑	(345)
(十二)漳平永福窑	(347)
(十三)晋江土尾庵窑	(348)
(十四)东山磁窑窑	(349)
(十五)云霄火田窑	(350)
图 版	(352)

序(一)

《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是欧阳先生有关古陶瓷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项新成果、新成就和新收获。

欧阳先生曾专攻书画篆刻创作及其组织社会活动,后又从事编辑等工作。在上述领域里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如国内外数十种报刊、书籍发表作品及论文并多次专题介绍其成就。《中国文化报》等曾以《“鬼手”欧阳》为题介绍其艺术成就。在艺界享有“鬼手”之誉。

多年以来,欧阳还潜心于我国古陶瓷收藏和研究,勤于窑址调查和标本、资料的搜集工作。在福建工作其间,几乎跑遍了八闽古窑遗址,已调查窑址数百处,新发现多处唐宋至明清古瓷窑址,部分珍稀品种是他首次发现报道。并以继夜的开展这一领域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撰写了数十篇古陶瓷方面的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概括起来,该“文集”涉及面较广,研究较深入。可看得出其博览群书,知识面广,不但引用文献资料丰富、准确,还特别关注古陶瓷考古的最新成果。决不人云则云,观点新颖、独到。对研究而言,古陶瓷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多,资料的多少以及准确与否至关重要。欧阳常钻进图书馆查找并核实有关资料,资料复印件一摞一摞。难得可贵的是,其陶瓷藏品丰富外,窑址实物标本收集较多。文献和实物资料的充分占有,为其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不难发现,其论文即是他善于提出问题(立论),并解决(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问题。这正是研究论文所遵循的:掌握资料(包括文献、实物、标本),找到立论点,再提出并解决之。

“文集”涉及到陶器的起源、陶与瓷的分辨、三彩陶、绞胎(包括绞釉)陶(唐)瓷(宋以降)、素三彩等门类。在瓷器和瓷种方面涉及到青釉瓷(如龙泉青瓷、同安青瓷及国外高丽青瓷等)、青白釉瓷、黑釉瓷(如建窑、吉州窑、武夷山遇林亭窑、福清窑、南平茶洋窑、漳浦窑等)、青花瓷等。

可说涵盖面广,门类也多。

纵观该“文集”,我虽约略浏览了一遍,感到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重视和注意。

首先,最主要也是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多年来,他不畏艰辛、不怕风霜,常年深入和出现在古窑址第一现场,调查和采集古陶瓷标本,占有丰富而又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文集”中的《福建漳平市新发现明代瓷窑》、《福建古窑撷珍》之一至十五等。他这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痴迷和执着精神,值得我们专业工作者和古陶瓷爱好者学习。

其次,还是由于他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证据,又善于发掘问题,探索研究解决问题。使得有的悬而未决的谜底得以解开。如《日本所藏“灰被天目”之窑口探究——兼论日本“濂户烧”的根源在福建》、《日本“濂户天目”寻源》、《揭开“鹧鸪斑”纹神秘面纱——鹧鸪斑及窑口释考》、《木叶纹装饰研究》、《试析剪纸贴花瓷及其源流》等等,都是他洞察力和认真研究直至解开谜底的经典之作。《陶器起源的再思考》、《陶与瓷的分辨》、《“高温铜红釉”起源再探》等也是欧阳的追根溯源之作。

第三,欧阳先生敏于才华,善于独立思考,不落俗套,不步人后尘。固守真理,雄于思辩;坚持科学,敢于阐发。他在《论钧窑年代、性质兼及其他》、《建窑之“釉装饰”及分类初探》、《黑釉系列“胎装饰”试析》、《黑釉瓷的“特殊装饰”探微》、《试论黑釉陶瓷的绘画装饰》系列论文及《高丽青瓷与李朝瓷器略说——兼谈王志军〈高丽瓷器的收藏与辨伪〉》、《龙泉窑瓷与韩国高丽瓷的简单比较——和陈永志、苏东等先生商榷》、《也说“建盏”及其他》、《还说“建盏”及其他——兼答王志军先生》、《青花“科学定义”的疑惑和若干问题思考》、《宋青花瓷辨考》、《吾不识元青花》等文章,都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新思路、新认识和新见解。

第四,这本“文集”中,还反映出他的另一特点,这就是他见微知著,善于发掘日常生活中的陶瓷器件和器物;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习俗方面的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如《贯耳瓶略考》、《从闽北古陶瓷谈丧葬礼》、《闽北明器说谷仓》、《谷仓多管瓶、多角瓶之演变新考》、《博山

炉源考——兼说博山炉为“魂瓶”》、《五联罐与堆塑罐等明器源流及演化过程》、《从几组汉陶观古代乐舞——兼说“玉雕阿憨”原型仿东汉“俳优陶俑”》、《对陶瓷单、双管及多管插器的思考》、《青瓷“兽形器”之思考》、《陶瓷扑满》、《“虎子”再考》、《说“鬼灶”》、《高足莲花炉——宋代新品种》、《福建宋元绿釉陶瓷》、《福建宋代陶瓷省油灯》、《福建宋代陶瓷枕》、《罕见的巨无霸——赤土窑莲花尊》、《精美而特殊的陶器——漆衣陶、锡涂陶》、《古陶瓷中的性文化》等等,都是独辟蹊径的创新之作,有的放矢、有感而发的精辟之作。

第五,窑业技术、窑业工具等“文集”中不时涉及,其中《“火标”——窑业技术的进步》、《“试照”初考》、《窑业工具——瓷刀》等论文最为突出。欧阳并非专业古陶瓷研究者,却能在此领域取得如此成就。我为他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的科学治学精神所感佩。

总之,欧阳先生这部“文集”是一册洋洋数十万言,内容丰富、文笔流畅、条理清晰、文字简洁、论点准确而又通俗易懂的图文并茂好书。我们相信,该图文并茂的“文集”出版问世,是古陶瓷研究领域的一件幸事,也是一件好事,我们为他高兴和祝贺!这部“文集”的出版,对于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陶瓷文化,推动和促进古陶瓷领域的调查研究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开展陶瓷文化交流,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在“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承欧阳对本人的爱护,嘱我为序,冒昧草就上述文字,与欧阳先生共勉。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欧阳先生和读者指正。是为序。

叶文程

写于厦门大学东区 14—201 读书室

序(二)

纵观古往今来,凡在科学技术领域或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者(无论大小)均需具有独特的视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欧阳希君先生曾从事美术、编辑、出版等工作,均取得一定的成绩。同时他也在陶瓷史研究领域默默耕耘,“业余”地对陶瓷史中的一些关键和敏感的问题,或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课题进行了探讨。在有些课题的研究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从本论文集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一名“业余”研究者能取得这些成果是难得可贵的。

在陶瓷史研究中,由于研究者的阅历、观察问题的视角、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资料的积累均有所差异。因而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研究者还会出现域大或小的错误。这是任何一个研究者所不能完全避免的,只不过是错误的大小、多少或发现的迟早有所不同而已。但也应看到近二十余年来,在陶瓷研究领域中的个别研究者存在着严重的功利主义,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而浮躁之风则日甚一日。这严重地干扰了古陶瓷研究的正常进行,并在某些方面导致了研究水平的下降。因而,对目前业内已发表的某些论文或著作中的严重错误提出来加以指正,则是每一个陶瓷研究者应尽的责任。可喜的是,在欧阳希君的论文集中对此则有所体现。这在当前亦是难得可贵的。

中国陶瓷生产有万年左右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且连绵不断。这在世界陶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然人生苦短,生命有限。每个人不可能对中国陶瓷史内容全面掌握并在各方面均有精深的研究成果。由是观之,欧阳希君先生的论文集所述内容略显宽泛,今后应精选研究课题,集中精力可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欧阳希君先生正处在青壮年时期,更高的学术追求是完全能够达到的。

殷切期盼欧阳希君先生将有更多的论文和专著出版。

马文宽

写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前言

本“文集”附有大量精美图片，实为“图文集”。“文集”共收入欧阳先生精选的论文 76 篇。部分曾见于《中国文物报》、《收藏快报》等报纸和《文物天地》、《景德镇陶瓷》、《收藏》等刊物以及《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民间收藏论丛——第四届全国民间收藏文化高层论坛文集》等。

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因考虑版面等问题，比较“精简”，或是报刊原因有所删节。又随着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考古资料公布的增多，有些原发表的论文在收入本“文集”时，内容作了增改，幸不使其为“旧文”，故以“文集”为准，以趋于更完善。

欧阳先生是著名的收藏家，以陶瓷器为主，书画篆刻及相关碑帖亦为其收藏之强项。因不是“文博圈内”人士，故其文章不怕得罪权威，只要见有不正确或是值得商榷的文论，他都敢说，那怕是他最敬佩的老师。叶文程、马文宽是欧阳最尊敬、最佩服的两位大陆学者，谢明良则是他最敬佩的台湾学者，但只要是其文中有似可商榷的问题，他也会直言指出。收藏爱好者及师友常会给欧阳看些藏品，他也只是照实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些曾经过专家看过的“真”东西，欧阳也会据理指出是赝品。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他写了不少针对古陶瓷学者、研究者、藏家“错误观点”的文章，也许并不被读者、媒体所喜爱。如果没有坚实的功底，是难以发现这些问题的。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是有感而发的心声，而非某些东拼西凑的词组，比那些无病呻吟的为写作而写作的用于评职称的文字强得多。

《世界学术文库》是系列综合性学术论文集，由世界学术文库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其中《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已由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言实出版社和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出版了一～三集。《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是我们首次以华文编辑出版的个人论文专集。我们看重的是该“文集”的学术价值，相信该书的出版，定会在国内外古陶瓷研究和学术界起到不小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效果是积极的。

有关该书的学术及资料价值，古陶瓷研究权威学者叶文程、马文宽先生在序言中已有结论。序文中的言词是否只是溢美之词，相信读者自会分辨，交由读者判评。

编者

陶器起源再思考

陶器的起源？这个问题《中国陶瓷》^[1]、《中国陶瓷史》^[2]等早回答，但部分却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引起笔者深思。

翻开《中国陶瓷》^[3]，只知“我国现存最早陶器残片出土于南方地区的一些洞穴居住遗址中，据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9000~10000年。”过去关于陶器的起源多承袭“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织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产生的。最初是用泥糊在编织物上烧成的，后来就直接用泥制坯烧制了”^[4]，“这种说法虽引人入胜，但愈来愈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如果用这种方法烧制筐篮那样大小的陶器，结果只能得到一堆瓦砾。”^[5]世界上陶器发明最早的是我国吗？是那个国家？这个看起来似不难回答的问题，却少有人回答，《中国陶瓷史》^[6]亦未回答。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烧制陶瓷器皿的国家。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居住在洞穴中的远古先民通过长期劳动实践以及聚居生活的需要，已经学会了用陶土烧制简单的陶器。”^[7]“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器表明，中国是陶器制作的故乡，因为它比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西亚穆勒拜特遗址出土的四件低温陶器要早五个世纪。”^[8]若按传统提法，最早的陶器出现在西亚，距今约7000年前；东北亚地区则稍晚，西北亚约6000年前，中国约5000年前。而随着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遗址、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掘，中国的制陶向前推进了约5000年，即距今约9000~10000年，仙人洞的第3B1层碳十四测定为距今约12500年，那么仙人洞和吊桶环早期陶器年代当不会晚于这个年代^[9]。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深腹大口罐经测试，距今10000年以上，一说距今约14000年，是我国最早的原始陶器^[10]。所以我国部分学者自豪的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烧制陶瓷器皿的国家”、“中国是陶器制作的故乡”等。

然而，我们是否注意到，日本岩宿时代（指日本列岛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出现了粗陶，“日本的原始粗陶受到世界的广泛注目，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起源古老，可追溯到距今13000年前；二是持续期长，绵延近1万年；三是艺术性强，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土品无法望其项背。”^[11]日本学者早就提出“日本陶瓷拥有世界陶瓷史上最为悠久的历史，它那12000年的漫长文明甚至比长达8000年的中国陶瓷还要古老……日本烧制陶瓷器是世界上陶瓷史上之嚆矢，但它当时的形态无疑是不带釉彩的朴素土器。在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中，这种土器却堪称揭开文明序幕的最初的科技发明。”^[12]但是并未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包括日本也不是全盘接受。曾主持日本福井洞穴遗址首次发掘工作的芹泽长介教授认为：“距今约12000年前，兼有粗陶制造和特殊的细石器制造技术（福井技法）的文化，出现在九州的西北部。这些新的文化诸要素，与其说是日本旧石器人所独创，我认为由大陆传入日本的可能性更大。”^[13]“1998年日本青森县蟹田町大平山I号遗址出土的陶片经碳14测定约16000年制作。”^[14]本州北端的Odai Yamamoto I site发现了年代距今15300~16500BP迄今最古老的日本陶器遗存。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发掘出早于日本的距今约16000年前的陶片，但出土陶器（片）的年代不断推前，从距今5000年、6000年以至7000年至9000年，甚至12500年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距今约9000~10000年的仙人洞陶片388块，全部饰有绳纹，从数量和形制

分析,绝对不是最原始的粗陶。”^[15]说明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将来定会发掘出现早于距今约 10000 年前的陶器(片)。证明不但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陶器亦是我国古代的发明创造。证明日本陶器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等,但终究是推测,科学必须实事求是,用实物说话,在不见早于距今 16000 年前的陶片出土前,我们不能不承认,目前日本出土的距今约 16000 年前的陶片早于中国,也不要没有证据前像部分人士一样“怀疑测试年代有误”等。桂林附近的庙岩堆积自上而下分 6 层,整个遗址的年代在 1.2~2 万年,第 5 层下部出土几片极为粗糙的灰黑色陶片,两个碳 14 年代分别为 15560 ± 500 和 $15660 \pm 260\text{BP}$ 。证明芹泽长介教授“大陆传入说”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陶瓷史》^[16]这样的史书应该告诉大家,目前世界上出土最古老的陶器是距今多少年,不要羞于说出是日本,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不存在羞涩,以免读者多费时间与精力,查阅了哪许多书籍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先烧制陶瓷器皿的国家”、“中国是陶器制作的故乡”的提法尚未得到科学证实,起码在没有证实之前轻率提出不适合。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是中国人发明并烧造出了精美的瓷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但日本出土陶器目前早于中国,我们承认。虽然日本出土了世界上距今约 16000 年前的粗陶,但“陶器起源于日本说”也未免有操之过急之嫌。日本的原始粗陶受到世界的广泛注目,不但起源古老,可追溯到距今 16000 年前,而且艺术性强。我们从以下几件日本绳纹时期陶器(图 1-1~1-4)中可知“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土品无法望其项背”决非夸张。

注释

[1][3][5]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修订版。

[2][6][16]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8 年。

[7]穆青:《定瓷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8]熊寥:《中国陶瓷美术史》,紫禁城出版社,1993 年。

[9]冯浩璋:《新石器革命先行者的足迹——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考古杂志社编《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10]周世荣:《湖南古墓与古窑址》,岳麓书社,2004 年。

[11]王勇:《古代日本的粗陶艺术——兼释“绳纹维纳斯”之谜》,《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户川芳朗先生古稀纪念》,中华书局,2002 年。

[12]矢部良明:《中国陶瓷对日本陶瓷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艺术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3]芹泽长介:《日本旧石器时代》,东京岩波书店,1982 年。

[14]关涛、王玉新:《日本陶瓷史》,辽宁画报出版社,2001 年。

[15]熊寥:《中国陶瓷》,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 年。

陶与瓷的分辨

陶瓷是中国古代人民对陶瓷器皿的总称,一般不作深究。以至 1934 年出版《中国陶瓷史》根本是陶、瓷称谓混用,陶与瓷的真正区别划分是近现代的事。陶与瓷的区分关系到瓷器的起源问题,如果陶瓷不分,怎么能大谈瓷器是我国发明的呢? 因为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我国是陶器发源地。所以陶与瓷的区别主要集中在瓷器的起源上,对后世的唐三彩、“宋三彩”、“辽三彩”、“金三彩”、“素三彩”以及铅釉器的陶瓷属性一般无人追究。自巩县窑“唐青花”出土后,唐代陶与瓷的属性也主要集中在“青花”定义的影响下而探讨。本文不涉及瓷器起源之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很难有公认的定论。

一、粗陶、印纹硬陶、低温铅釉陶的胎、釉成份及烧成温度

最初的陶器质地粗糙疏松,对泥土要求不严(或可说对泥土没有特别要求),陶制品出土地点的泥质就是它的原料,都含有大小不等的砂粒,一般烧成温度约 700°C 。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器型增多,各类炊煮器、食用器、贮藏器以及陶网坠、弹丸、纺轮等都反映了制陶技术的进步,此时烧成温度多在 $900\sim 1000^{\circ}\text{C}$ 间。到商代,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在南方开始出现,为商周原始瓷器和瓷器的烧造成功铺平了道路。陶器的胎土一般都含有较高 Fe_2O_3 ,所用原料多属易熔粘土,在 1000°C 以内温度烧成。印纹硬陶中的 Fe_2O_3 含量已有所降低,所用原料一般为含杂质较多的瓷石类粘土,烧成温度高达 1000°C ,但印纹硬陶出现初期,其化学组成变化较大,烧成温度亦不很稳定。印纹硬陶比其他陶器更具坚硬致密的质感,有赖于其化学组成的改进和烧成温度的提高^[1]。

铅的氧化物作为低熔点熔剂成分引入陶器色釉的制作始于我国西汉,至唐代已形成了多彩铅釉体系,其黄、绿、赭、蓝、白各色釉都可制成不同深浅色调,使铅釉陶形成了著名的“唐三彩”,至宋代、辽代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宋三彩”、“辽三彩”陶器。

汉代铅釉陶器的胎为含一定量 CaO , MgO , K_2O 和 Na_2O 熔剂的粘土制成,含铝量低,胎的吸水率为 $11\%\sim 13\%$, $950\sim 1000^{\circ}\text{C}$ 烧成。唐三彩的胎在化学组成上不同于汉代铅釉陶,其含铝量高,而含铁质和熔剂矿物成分低,胎质较优,素烧温度可达 1100°C 。唐三彩釉的基本组成与汉代铅釉相近似,在 $900\sim 1000^{\circ}\text{C}$ 范围内即可形成良好的釉面。宋三彩、辽三彩是唐三彩生产工艺的延续,胎、釉成份基本相近,在化学成份上属同一类型和范围。

二、原始瓷、青瓷的胎、釉成份及烧成温度

继印纹硬陶出现后,商代出现了“原始瓷”。经不断发展,东汉烧成青釉瓷。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过渡。原始瓷器胎以灰白为主,也有灰色较淡或较深,少数呈褐色,一般较致密,略有吸水性。内外施玻璃釉,厚薄不匀,釉色青中带灰、青中泛黄、黄中带褐以至颜色较深的呈酱色。一般胎、釉结合不好,易剥落。胎的原料处理粗糙,有时肉眼可见到釉层下的粗颗粒石英砂和较大气孔。原始瓷胎所用的原料可能类似于瓷石组成的粘土原料,因原料都就近取于地层表面,故含杂质较多,处理也不够精细,特别是 Fe_2O_3 和 TiO_2 的含量有时也较多,使胎质呈灰白或褐色。原

始瓷釉是粘土配以草木灰或其它 CaO 的矿物质,属高温钙釉。原始瓷烧成温度一般在 $1100\sim 1280^{\circ}\text{C}$ 。

瓷和陶的差别在于它的外观坚实致密,断面有玻璃态光泽,薄层微透光。在性能上具有较高的强度,气孔率和吸水率都非常小。在显微结构上则含有较多的玻璃态和一定量莫来石晶体。作为一种器皿,瓷器还必须带有一层玻璃釉。这些特征则取决于它所用的原料和烧制工艺。越窑青瓷与原始瓷在化学组成上差别不大,只是 Fe_2O_3 和 TiO_2 的含量相对减少,用来烧制青瓷的原料已较原始瓷更为纯净,以致 Fe_2O_3 和 TiO_2 的含量相对减少。原始瓷胎料为类似于瓷石组成的粘土原料,越窑青瓷胎料为瓷石。瓷石的矿物组成主要为石英和绢云母,但由于风化程度不同也会有少量其他矿物。这些矿物组成反映在化学组成上则是高 SiO_2 、低 Al_2O_3 和一定量的 K_2O 和 Na_2O ,以及少量 CaO 、 MgO 、 Fe_2O_3 和 TiO_2 等杂质。南方瓷石的化学组成变化不大,一般 SiO_2 含量在 $74\%\sim 79\%$ 之间, Al_2O_3 含量在 $13\%\sim 18\%$ 之间,熔剂总量约在 8% ,这样的化学组成正符合在 $1200\sim 1300^{\circ}\text{C}$ 这段范围内烧制的瓷器所需的化学组成。由于当时只用瓷石作为制瓷原料,也就形成了我国南方早期的石英—云母系瓷的特色。只到了元代才在瓷石中掺用高岭土才形成石英—云母—高岭石系高硅质瓷。

三、陶与瓷的界线

一般来说,大家谈论这个问题时,习惯采用瓷书中常见的几条:1、瓷器的胎质必须是瓷土(高岭土、长石、石英等或者含有这些成分的瓷石和瓷土构成)烧成;陶器一般为陶土(有的可能也含少量的高岭土或其他粘土)。2、瓷器必须经过高温,火候达 1200°C 以上(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不尽相同,主要看它是否烧结),胎质基本瓷化;陶器一般为 $700\sim 800^{\circ}\text{C}$,有的可达 1000°C 。3、瓷器表面一般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陶器一般无釉或施低温釉。4、瓷胎烧结后,没有或微有吸水性,叩之声音清脆;陶器则具有吸水性,叩之声音低闷。5、瓷器胎质一般为白色或以白为主色调;陶器的胎质均有色,如红、褐、灰色等。6、瓷胎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即薄层透光;陶胎不透光^[2]。

简单地讲,是从主要三个方面界定,①胎质:陶属易熔粘土,含铁(Fe_2O_3)较高;瓷所用原料以瓷石为主,含铁量低,少杂质砂砾;②釉料:早期陶器无釉,西汉时施低温铅釉;瓷器釉料为钙釉(石灰釉、石灰—碱釉);③烧成温度:陶器一般为 $700\sim 1000^{\circ}\text{C}$;瓷器在 1200°C 以上。

因为4~6已不是属性问题,而是特征。古代科学不发达,绝不可能从胎质成份和烧成温度等现代科学手段来分析它的属性,只是凭感觉(特征)。即眼看外观(釉色、胎色),手触胎体(厚薄、光洁),耳闻器音(清脆或闷哑)等分区别陶、瓷。如果用国外现代关于瓷的定义来理解我国古代瓷器是不切实际的。欧洲大约1575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成功烧造出瓷器,而英国瓷器的烧成晚至1800年左右。由此看来,国外关于瓷器的说法是对16世纪后期在欧洲出现这样一种新的物质,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所进行的科学总结,这是重要的。但也应该看到,它对遥远的古代东方所发生的人们对于天然资料的利用、成就及其漫长的发展过程是没有涉及的^[3]。

四、原始瓷、“釉陶”即是准瓷器或早期瓷器

若从字面上理解,“瓷”字最早见于晋人吕忱的《字林》,但该书宋元间已佚,只能看到辑逸本。魏晋时期潘岳(247~300年)的《笙赋》中提到“倾缥瓷以酌酃”。而成书于东汉许慎所编的《说文

解字》却不见“瓷”字。50年代有人据此提出:真正的瓷器出现在魏晋^[4]。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一批汉简和系在器物上的墨书竹牌,如盛酒、酱、盐的罐写“米酒二资”、“白酒二资”、“酱一资”、“盐一资”^[5]等。唐兰先生认为:盛酱和酒等的资,就是瓷字,《说文》没有瓷字,可见原来借用资字。从出土遗物看,有22件硬陶罐,其中笋、鱼骨、梅等与简文符合,数目也近似。那末,资这种器就是硬陶罐。从西汉初到晋初约400年,潘岳《笙赋》才有“缥瓷”的名称,就是青瓷。吕忱《字林》有“瓷白瓶长颡”的解释,那是白瓷。瓷器替代铜器、漆器而兴起,而其名称仍沿袭硬陶罐为资的旧称,或从瓦或从缶。瓷器名称见于文人笔墨和编入字书,总要晚于它的出现时期^[6]。宋伯胤先生据此推断:西汉初年湖南地区的人们就把这种用高岭土之类作胎,火候较高,器表施褐色或黄绿色釉的硬陶罐叫做“资”,即瓷器^[7]。证实我国瓷器应出现在不晚于西汉初期。

陶藉人先生则认为:“瓷”字虽见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但瓷字为宋初人徐铉奉敕补入,许慎时代是没有这个瓷字的。虽然已故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考释竹简上的资字即指硬质釉陶罐,“资”即今天瓷器的瓷字。既然西汉初年贵族已把这类窑器称作瓷,已形成“瓷”的概念,何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和两汉以至三国时代的著述中竟没有相应的反映呢?再联系马王堆出土简159“瓦资一”、简220“瓦替”,我们认为“资”在这里很可能只指陶罐的形状,而“瓦”则是质地说明。比马王堆遗策稍早的文献《楚辞·卜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中的“瓦釜”,就是这类构词的形式^[8]。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陶器与瓷器应从胎质与釉质两点加以区分,印纹硬陶中的 Fe_2O_3 含量虽已有所降底,但所用原料为含杂质较多的瓷石类粘土,其化学组成变化较大,烧成温度亦不很稳定。它正是陶与瓷的分水岭,可称为“原始瓷”。

因此,凡瓷胎施钙釉者应视为瓷器。

五、釉陶只代表低温釉,“高温釉陶”名不符

原始瓷或称为“釉陶”的胎料已类似于瓷石组成的粘土原料,烧成温度明显高于印纹硬陶,所施釉(呈色和色调不同)经化学分析均为石灰釉^[9]。故它应是“准瓷器”或“早期瓷器”,而不应叫原始瓷,更不该称“釉陶”,以避免与低温铅釉陶混淆。“釉陶”顾名思义,是将釉施于陶胎上,陶胎只能施低温釉。考古资料表明,真正的釉陶不是在商代出现,而是从汉代才开始有的。因此,为区别真正的釉陶,才又多加了高温两字,称“高温釉陶”。在铅釉陶还未出现以前,由于瓷器有釉的优越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于是在陶器上开始施釉,于是出现了铅釉陶。因此,确切地说,不是瓷器从釉陶发展而来。相反,是瓷器影响了陶器,才出现了陶器上施釉的“釉陶”。据此,中国陶瓷发展的过程应当是陶器的出现与发展促进了瓷器的发明,而瓷器发展后又影响了陶器。所谓“高温釉陶”也就不能成立了^[10]。陶器的胎是粘土,与瓷胎的瓷石化学元素截然不同,已无须论证。

六、部分有待正名的陶瓷制品

(一) 三彩釉陶器

对于西汉及以后的铅釉陶器的陶瓷属性,已有公论。唐代及以后的铅釉产品属性问题,目前名称较混乱,如唐三彩,是从釉陶发展而,釉彩有黄、绿、褐、蓝、白等,以黄、白、蓝为主。因唐三彩

色彩鲜艳,釉色光洁,过去不少人将它误认为是瓷器,现已公认它为陶器。因为凡是铅釉器都是二次烧成,目前科学证据尚无法证实有一次烧成的铅釉器存在。翻开《中国陶瓷史》^[11],唐三彩等铅釉器定性为陶,而同一属性的绞胎器却定为瓷;隋唐洛阳城出土的铅绿釉连体双凤柄陶壶,被定名为“连体双凤柄瓷壶”^[12];隋唐扬州城遗址出土的绞胎碗,被定名为“黄釉绞胎瓷碗”^[13]等。而一些非专业书籍报刊更是不足而奇。出现将釉陶说成瓷器的现象,这只能说他们根本不关心,也无所谓它是陶是瓷。

《唐绞胎器的胎、釉和制作工艺研究》^[14]认为:1、唐绞胎器“是陶或是瓷”应由烧成温度而定,以唐三彩素胎的烧成温度 1000~1100℃ 为上下界限,1100℃ 左右者为瓷,1000℃ 左右者为陶。完全抛开了最主要的胎、釉化学组成的关键问题。2、唐绞胎器的生产窑场有:巩县窑、耀州窑、越窑。

该文已测试唐绞胎器的胎虽为“高铝黏土”(与三彩器相同),但釉则为“铅釉”。既然承认唐三彩属于陶器,而相同的铅釉绞胎为什么又会是瓷呢?关于唐代绞胎器的生产窑场目前除巩县窑见实物标本出土外,尚有山西。该文所说的耀州窑是唐代生产绞胎器的窑口,注明资料出处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嵯振西、杜葆仁执笔)《唐代黄堡镇窑址》,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经查,其用词与霍玉桃等《唐三彩铅釉陶的研究》^[15]基本相似,只多了“才确认河南巩县窑和陕西铜川耀州窑……也是唐代生产绞胎器的窑口”。其实,书名根本没有“镇”字,他人笔误,其也跟着错了。这本上下册的考古报告笔者早已熟读,难道有误,再次将《唐代黄堡窑址》(上下)^[16]、《五代黄堡窑址》^[17]等发掘报告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实在找不到其所言的“耀州窑只有残器”的绞胎器。据说黄堡窑只出土了 2 片绞胎枕残件,出于慎重,发掘报告《唐代黄堡窑址》上都不曾提及^[18]。

关于 1972 年陕西乾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706)出土的目前“仅见一例”的绞胎骑马狩猎俑,该文未注明出处。笔者补充一下,该绞胎俑曾见于王仁波《唐三彩骑马狩猎俑》^[19]、中国陶瓷编委会《中国陶瓷·唐三彩》^[20]、考古杂志社《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21]等,定名亦不同,如“三彩绞釉射猎俑”、“贴金铠甲骑马俑”(该墓同时出土了 2 件三彩绞胎射猎俑,2 件贴金铠甲骑马俑,可能是图文误植)等。通高 36、长 29.5 cm,人马全部绞胎,现藏陕西省博物馆。另一件三彩绞胎骑马狩猎俑^[22],通高 35.5、长 30 cm,人马全部或部分绞胎,现藏乾县博物馆。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两件绞胎俑均为三彩釉。此外,1979 年 9 月郑州市公安部门收缴一件绞胎马俑,头部残失,周身绞胎,扭颈静立,造型精美。是目前发现的第二件(笔者注:应该是第三件)绞胎陶塑品^[23]。越窑生产唐绞胎器吗?从历次大范围越窑发掘中,目前从未见出土唐绞胎器实物标本。其文中提到的:越窑仅见一例“镶嵌的青瓷绞胎虎枕”,是否出自窑址?经笔者查明,是出自浙江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同时出土的青瓷产品中一件青瓷印花碗上印有“大中二年”(848 年)楷书铭文。该枕又被定名为“灵芝纹伏兽脉枕”^[24],通高 7.5~9 cm,宁波市文管会藏。

黄冶窑是全国范围内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处唐代烧造绞胎制品的窑场。盛唐时期开始烧绞胎制品,北宋时绞胎工艺传到修武当阳峪窑、焦作恩村等,随北宋亡而终止^[25]。黄堡窑、越窑唐代是否烧造过绞胎器呢?目前在没有找到绞胎器窑址前,尚不能说陕西、浙江墓葬、遗址出土的绞胎器,就一定是出土地窑场产品?如按此说,河北钜鹿故城发掘了少量绞胎器^[26]、吉林和龙北大渤海墓葬中出土了绞胎碗^[27]、安徽亳县出土黄釉绞胎枕^[28]等,就可说是这些地区窑口烧造的了么?当然,限于大型绞胎俑产品易碎和不便于长途运输,目前还不敢断言这些绞胎器一